



2023年2月3日
星期五

第 1896 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主管主办 网址:WWW.STUDYTIMES.CN
报名题字:江泽民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137 代号:1-267

重要言论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只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夯实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才能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胜利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学点本事为国家做贡献

——邓小平的家书

□ 蒋永清

(一)

目前所知邓小平最早的家书是他19岁时写给父母，坚决要求退婚的信件。1920年，16岁的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切身体验之后，邓小平感到：“生活的痛苦，资本家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性的痛恶略有感觉”，他认为只有通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才能救国救民。在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的引导和帮助下，他投身革命斗争，接受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

1923年是邓小平从一个普通的勤工俭学生成长为职业革命家的关键一年。这一年，邓小平正式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是在这一年，接受了新思想新思潮熏陶的邓小平致信父母，要求解除幼年定下的“娃娃亲”。1926年1月，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自传中详细描述了这个过程。邓小平写道：“我到法国后，‘自由恋爱’的呼声，充满了我的耳鼓，触发了我的心事，于是我决定写信回家退婚了。不久我便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更觉得一个不识字不相识而毫无关系的女子，于我将来的革命工作实无补益且有障碍，于是又接连写了若干封信向我的父母请求退婚。不两月，父亲的回信到了，大骂我这种行为是不孝，是大逆，并且说‘倘故意违拗，家庭与汝从此脱离关系任其所为可也’的忿话来。我怎么办呢？当然，只有两条路：一是受家庭的软化；一是与家庭脱离关系。于是又写了一封信回去，坚持退婚的主张。结果，他们以后的来信，也不说

脱离关系的话了。”由于邓小平的坚持，父母也没有办法，只好做“亲家”唐家的工作，最后，邓小平“娃娃亲”的对象唐氏由邓家置办嫁妆，作为邓家的女儿嫁出去了。

除了要求退婚，邓小平还在家书中表示，自己已经投身革命事业，不能回家了。这种言论，在旧中国封建思想浓厚的背景下无疑是惊世骇俗的，用邓小平弟弟邓垦回忆的话来说，邓小平一是要求解除“娃娃亲”，二是告诉家人自己参加了革命不能回家。这几封家书，对于希望邓小平学成归来、光耀门楣的家人冲击很大，而对于19岁的邓小平而言，这些文字的背后，真实地透露出他对革命的满腔赤诚和对信仰的无比坚定。

(二)

邓小平与夫人卓琳相伴58年，却鲜少用书信交流情感。早在1939年8月，邓小平与卓琳结为革命伴侣的第四天，邓小平就因为战事匆匆赶赴太行山抗日前线，卓琳则留在后方的八路军总部。在夫妻离别的日子里，新婚的卓琳渴望多了解丈夫一些，便向邓小平抱怨道：你是不是要经常给我写信？邓小平不解风情地问：我写什么？卓琳“开导”地说：写写你怎么生活，你有什么感想。邓小平开玩笑地说：那好，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再印几十份，一个月给你寄一份。听邓小平这么一说，卓琳只好放弃了索要家书的“奢望”。

(三)

1969年，邓小平下放江西劳动。在江西三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很少写

虽然邓小平未曾给卓琳写过浪漫的家书，但在1976年6月邓小平给卓琳写下的一张便条，其中蕴含的深情与惦念不比长长的家书少。

1976年，邓小平又一次陷入政治困境，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4月7日下午，邓小平、卓琳二人被转移至东交民巷17号，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其后，卓琳因角膜溃疡住进301医院，二人不得已分开，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夫妇唯一一次分开。住院期间，卓琳十分牵挂邓小平的安危，她给邓小平写下便条，叮嘱他千万不要离开现在住的地方。6月10日，邓小平致信汪东兴并转报毛泽东、党中央，提出同孩子们同住、或者首先允许他们来看望的要求。次日，毛泽东同意邓小平来信请求。得到这个好消息的邓小平立即给还在医院的卓琳写了一张便条：“已批准我们同孩子们同住，在原处。孩子们是否全回，须同他们商量。几天后才动，注意秘密。你既可见到孩子们，就不急于出院，把别的病也治一治。”

风雨飘摇的境遇沉浮中，爱与家的温暖最能给予人力量与信心。这封不过几十字的“家书”，是邓小平同卓琳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笔纸往来。纸短情长，不言自明的是这对相伴相依的夫妻，对彼此最深刻的了解与最默契的关爱。

家书的老人为生活和子女问题给中央写了十来封信。在政治生涯低谷时期，党组织是邓小平最可信赖的亲人，遇到生活中的难题，他提笔向亲人倾诉。“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曾对邓小平说有事情找汪东兴，所以邓小平的这些信都是写给汪东兴的，由汪东兴转给毛泽东。

在邓小平给中央的信中，提到最多的就是大儿子邓朴方。“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北大读书的邓朴方因不堪忍受造反派的凌辱和虐待，选择跳楼以示抗议，因救治不力，形成高位截瘫，留下终身残疾。到江西后，邓小平十分牵挂留在北京的儿子治病问题，不断给中央写信求助。

1970年10月17日，因得到通知说邓朴方将被送来南昌同父母一起生活，考虑到医疗条件，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恳切希望儿子能留在301医院继续治疗。虽然在邓小平的要求下，送邓朴方去江西一事暂时作罢，但不久后，邓朴方还是从301医院被遣送至北京市社会救济院，且身边无人照料。得到消息的邓小平心急如焚，于1971年2月3日致信汪东兴，请求组织上派人把邓朴方送来南昌：“我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清河疗养院的条件又是如此，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去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6月，邓朴方被从北京送到南昌。从此，邓小平和卓琳在工厂劳动

之余，全心全意地承担起照看邓朴方的责任。在照顾邓朴方生活的同时，作为父亲的邓小平，想尽一切办法让儿子振作起来，时常推着儿子去晒太阳，与儿子一起聊天，把从北京家中带到江西的藏书拿给儿子看，帮助邓朴方鼓起生活的勇气。邓小平还鼓励邓朴方继续学习科学技术，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国内政治形势有所好转。邓小平于1972年4月22日给汪东兴写信，再一次谈起邓朴方的治疗问题：“我的大儿子邓朴方，接回来近一年了”，“我们总希望还能有一次医治的机会，如果有可能再送回医院治疗，或施行手术。对此，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党提出请求”。6月27日，周恩来批示：如邓的大儿子能再施手术似可让其来京施手术。随后，中央同意邓朴方回北京住院治疗，至此，邓小平夫妇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

“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在远离北京千里之遥的江西，为孩子治病、上学、工作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拿起笔，一封一封地给中央写信，这固然是一个父亲对子女、对家庭的牵挂与爱护，同时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同

中央保持一线联系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些信中，他反复表达了对革命工作的忠诚与坚定，多次提出“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大家做点工作。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就再没有写过家书。人们常说，邓小平的文章是说出来的，不是用笔写出来的。那是因为他遇事总是先在头脑中缜密构思、深入思考，然后一气呵成、出口成章。把他的讲话记录下来，几乎不用修饰就是一篇结构严谨、思想深刻、语言流畅的经典好文章。从这个角度说，1993年1月3日，89岁的邓小平同孙辈们的一次聊天可以视作他晚年的一封重要“家书”。

晚年的邓小平很喜欢和儿孙在一起边吃饭边聊天，在这次聊天中，邓小平回顾自己的一生，感到心中无愧，他对聚在一起的孙辈们说：“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望着朝气蓬勃的年青一代，他的思绪回到了70多年前风华正茂的峥嵘岁月。他总结勤工俭学的经验就是“锻炼”二字：“在法国一呆就是五年，那时话都不懂，还不是靠锻炼。”

他对晚辈们寄予殷切期望：“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做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这位为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事业奋斗了一生的老人，对后辈最大的期待就是本事无论大小，但要有家国情怀。要在大风大浪中去实践、去经受考验，把对小家的眷念凝结成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的大爱，以责任和担当托举起大写的人生。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主任、编审）

老一辈革命家的家书

苟利国家生死以

林则徐虎门销烟

□ 王煦

林则徐（1785—1850年），清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他是近代中华民族捍卫国家主权、反抗殖民侵略斗争中涌现的伟大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座巍峨丰碑。他在深刻影响了历史走向的同时，更不断带给后人以思想上的教益与激励。

立经世之志，成济民之事

林则徐能够成为忠诚爱国、忧民济世的一代名臣、民族英雄，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滋养。林则徐出身于下层知识分子家庭，自幼接受系统的儒家文化教育，也习得了深厚的传统道德修养。他曾经撰写过一篇“十无益”家训，其中就有“存心不善，风水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作事乖张，聪明无益”等条目，鲜明地体现了林则徐对正心、齐家、笃行等中国传统修身处世之道的服膺与践行。

在林则徐身上，我们还能看到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勤奋务实等思想的积极影响。清朝后期，政治腐败，国力衰颓，弊窦丛生。于是，倡导不尚空谈、直面现实、推进改革，以“匡时济民”挽救国家危局的经世思潮兴起。这是时代的呼声，也是林则徐从政道路的选择。早在求学时期，他就立下“经国救世”之志，为学“实事求是，不涉时趋”。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官之后，他“益究心经世学”，还编撰了《北直水利书》为朝廷治水建言献策。之后，林则徐在多

个省份担任地方官，每到一地，他都力求“兴利除弊”“利用便民”，治理水患、整顿盐政漕务、奖励农业生产、清理吏治，“所莅治绩皆卓越”，成为朝廷中经世派官员的代表。后来他能够锐意禁烟御侮，更与“经世致用”思想密不可分。

鸦片不绝誓不回

嘉庆、道光时期，清廷内部倡导“经世致用”的开明官员不乏其人，而能让林则徐脱颖而出、成为一代民族英雄的，正在于他不但善“治内”，还能“治外”，跳出传统王朝治理的定式，将维护国家安全的视野投向了外交和边防。

对鸦片贸易之危害、海防问题之严峻，林则徐久有了解。早年任江苏按察使时，他就认为江苏风气败坏，全因鸦片害人，于是下令江苏禁烟。在1838年清廷的禁烟大讨论中，他更严正指出，“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直指鸦片问题之要害，打动了道光皇帝。随即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禁烟事关外交，牵涉面广，阻力很大，对此林则徐早有准备。赴任之前他就向同僚和师友表示，“原知此役乃蹈汤火”“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表现了一位进步士大夫忠心谋国、大公无私的高风亮节和无畏气概。

从1839年3月抵达广州到1840年10月被革职，林则徐主持禁烟并领导抗英斗争十余个月。其间他详密访

查，精心谋划，一面对外国鸦片商人据理力争，严行禁令，法在必行，绝不姑息；一面查处与外商沆瀣一气的本地不法行商、官员，整顿官场和社会风气，体现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高度原则性和严肃性。依靠过人的政治能力和清廉刚正的官德操守，他应对内外反动势力软硬兼施的种种手段，始终立场坚定、志在必行：“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这掷地有声的表态，给不法商人和侵略势力以巨大震慑。最终，1839年6月，由林则徐亲自主持，在虎门海滩将收缴的近2万箱、总重230余万斤的鸦片全数公开销毁，取得了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的伟大胜利。

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坚持立场的同时，又不保守僵化、盲目排外。战斗在对外交涉与抗击侵略的前线，他深切认识到自己乃至整个清朝官场对世界形势、外国国情的无知，于是积极收集、翻译外文报刊和书籍，如将外国人针对中国的言论翻译汇编为《华事夷言》，将澳门外文报纸上的新闻和评论编译为《澳门新闻纸》，力求从中获取信息和情报，做到知己知彼。他还主持将英国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编译为《四洲志》一书，该书记述了世界上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状况，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完整

的世界地理志。后来，林则徐的同道好友魏源在《四洲志》基础上，又增补成《海国图志》一书，影响益著。

林则徐还将西方知识运用于对敌斗争。他组织编译了西方学者的《国际法》著作（译名《各国律例》），并借此批驳英方在拒缴鸦片、治外法权等问题上的无理要求。随着国际视野的不断开阔，林则徐更意识到需要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才能抵御外国的侵略，于是萌生出“师敌长技以制敌”的思想，由此开启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挣脱保守封闭痼习、积极吸收借鉴国外发展经验与文明成果的先河。林则徐也被后人誉为晚清“维新运动的重要先驱者”，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开近代中国“塞防论”先声

在禁烟的过程中，林则徐对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图谋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一面主持禁烟，一面积极备战，修炮台，练水勇，严密布防，多次挫败英军挑衅。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后，他更是粉碎了英军进攻广州的图谋，书写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勇抗侵略的英雄篇章。

在广东占不到便宜，英军转而北上，先攻定海，再抵天津，直接威胁北京。清政府惊慌失措，朝内主和派得势，林则徐反成了战争失败的“罪人”。1840年10月，清廷将林则徐革职，之后又“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从一品大员沦为流放罪臣，林则徐并没有灰心丧胆、消沉堕落，而是全然以国家为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他在赶往新疆的戍途中，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旷世名句，至今警醒世人。到新疆后，林则徐更加积极投身于当地治理和建设实践。他捐修渠道、查勘荒地、改良技术、鼓励生产，至今伊犁还有“林公渠”存世。他高度重视新疆的边防，不断呼吁要警惕并防备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主张积极练兵、巡防、屯田，开近代中国“塞防论”之先声，为维护国家统一、边疆安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1845年，内外交困的清政府重新起用林则徐。1850年11月，他在赴任广西途中病逝，结束了波澜壮阔又充满遗憾的一生。林则徐终身都在践行生死利国的信念，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的突出代表，也是仁爱、民本、务实、勤勉、廉洁等中华传统美德的卓越践行者和弘扬者。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